

## 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与政府的关系：钟情独裁者？

作者：罗森博士 (Dr. Roland Lawson)

翻译：田兴全弟兄

校对：刘忆牧师

### 本研究课题的范围

我说服了我的大学允许我同时在社会学和历史学两个科系攻读博士学位，所以我在这两个系学习，我的导师来自这两个系，我博士毕业论文的外部审核专家也来自这两个系。所以我称自己为历史社会学家。社会学主要是解释我们的现状；历史社会学者会问我们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在我对全球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研究中，我收集到的最重要的数据来自全球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世界教会的 13 个分会，60 个国家中的 5700 位教友。我将与你们分享其中的一些发现。

基督复临安息日会起源于美国这个民主国家，而它最早的其它“老根据地”也在民主国家——欧洲、澳大利亚、南非。它预计这些民主国家(尤其是美国)会发生糟糕的事情，并预计更糟糕的事情还会在将来发生。在这些国家中，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聚集足够多的信徒或选票以产生重要的政治影响力，也没有多少信徒能当选以担任政府公职，它也没有期望这种情况会发生。

建会很久以后，殖民主义结束了，一些前殖民地也采用了民主的政府形式，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领导人们才惊奇地发现，随着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在“南半球”某些地区的蓬勃发展，他们信徒中有好些人被选举进入了好几个国家的议会，甚至在一些国家担任首脑。例如，就在此时，牙买加的总理和总督都是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信徒，还有一些复临信徒担任部长级职位；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是位基督复临会信徒，另有几个部长级职位也是由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信徒在担任。这种模式如此出人意料，教会没有做任何准备来预备它的成员去担任这样的高位。在我对发展中国家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政客的采访中，我发现当我问他们诸如他们的信仰如何帮助他们制定国家当前所奉行的政策等问题时，他们无一例外地茫然地盯着我。例如，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一些政客最终结结巴巴地说，他们帮助教会得到了一块土地，其他人说他们没有在安息日举行任何竞选活动。一位来自牙买加，这个非常贫穷国家的社会服务部长最后说，他收养了 19 名儿童。没有一位能回答说他们的复临信仰怎样影响了他们试图制定的政策，除了在牙买加和乌干达那些政客，他们把自己国家所通过的极其严厉反同性恋法律归功于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信仰，而在乌干达，对同性恋的惩罚甚至可以是死刑和无期徒刑。

然而，在与世界各地的独裁者和其他独裁政府打交道时，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往往获得了很大的吸引力，在这些地方，我们往往能成功地与当权者建立所谓的“交易关系”。交易关系有时被描述为“用一只手洗另一只手”——也就是双赢关系。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与这些政权的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变，所以我的例子是按时间顺序排列的。我还会指出这些关系发生的频率，并将考虑我所研究之关系的互动状态。

第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是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斯大林宗教镇压的开始是在 1924 年的“全俄大会”上。当时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领导人们被迫签署了一份声明，称服兵役关乎个人良心，由信徒个人自行决定。这一声明在 1928 年的下一届大会上得到了相当大的加强，它宣布服兵役是基督徒的职责，任何不服兵役的人都是异端，应该被开除教籍。同时，新的法律对宗教团体的传教活动和慈善工作进行了规范。通过接受这些条件，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可以公开运作，但却是在一个非常妥协的状态之中。然而，这一投降声明导致了俄国教会的分裂：一些俄国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信徒脱离了官方认可的教会，转入地下，从

而使他们自己处于时时受逼迫的处境。分裂者们称自己为“真实自由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派”(True and Free Adventists)：“真实”是因为他们忠于遵守安息日并拒绝杀人，他们指责官方教会破坏了这些诫命；“自由”是因为他们拒绝注册或与政府保持联系。他们的领导人弗拉基米尔·谢尔科夫(Vladimir Shelkov)在监狱里苦熬了几十年。然而，官方教会幸存了下来，尽管没有什么太正规的组织架构，而且与世界教会长期隔离；它只是通过个人接触慢慢发展起来的。

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与纳粹德国和希特勒的关系代表该会向独裁政权靠拢的大跃进。这一次增加了一些新元素，其中包括同情希特勒本人。安息日会认为希特勒是一位“差不多的复临信徒”，因为他不吸烟，不喝酒，且吃素。还有一个新元素是需要把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与同样遵守安息日的犹太人和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改革派区分出来。这些改革派人士因为持反战主义观点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就与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官方教会决裂了。一战期间，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为了证明自己的爱国主义，并为避免遭受任何惩罚而选择了妥协，即服兵役。但犹太人和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改革派这两个群体的成员都在纳粹集中营中大量死亡。结果就是，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在他们的晨钟课小册子里庆祝希特勒的生日，将他们所谓的安息日和安息日学改成不那么“犹太化”的名字，将有犹太血统的信徒开除教籍，同意信徒携带武器在德国军队服役，并在中欧分会给全体信徒一封信函中宣布，安息日在兵工厂上班是可以的，并继续热情地经营已经被纳粹接管的社区服务活动。他们因此获得了安全。战争结束后，因为拒绝服兵役而被大批送进死亡集中营的耶和华见证会迅速发展壮大，而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则远远落后不怎么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当苏联接管东欧国家时，复临信徒意识到，他们可以通过讨好这些政权而获得利益。他们接受政府指派的人为联合会的领导人，这些领导人享受特权生活。例如，他们可以去西方旅行，而其他同胞很少有机会。他们还通过给予国家喜欢的东西来获得好处。在波兰，这是为了攻击天主教会，它是该政权最强大的反对者，也是在教皇约翰·保罗二世(Pope John Paul II)担任教皇期间的宿敌，他是波兰人。这对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信徒来说不是问题，他们觉得共产主义政权比天主教会更令人舒服。例如，他们在教皇第一次返乡时出版了一期讨好政府的期刊。他们还与政府合作发出爱国呼吁，号召信徒在被操纵的选举中投票。教会领导人向我夸耀说，因为他们的协助，尽管在当时印刷纸张是限量供应，且杂志出版也受到严格控制，但他们却被允许了享受出版自由，以至于在七年的时间内，怀爱伦著作的发行量仅次于《圣经》和列宁的著作。给予他们的其它特权还包括允许他们在街道和政府书亭里自由出售他们的书籍，并允许他们在公共大会堂开布道会。尽管在波兰3800万人口中，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成员只有4700人，但他们仍然得到了这种优待。

我在整个东欧进行过两次采访：一次是在苏联时代末期，另一次是在铁幕(Iron Curtain)瓦解后的几年。我对罗马尼亚的第一次访问表明，对这样的政权谄媚的动态对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信徒既有好处，也有代价。会长和行政秘书告诉我说，他们与政权高层关系良好，最近获准建立一所神学院。然而，很快就可以看出，两位领导人决心要控制我听到的消息，因为他们确保我每次采访人时，他们都在场充当翻译。我注意到每个被采访的人都很谨慎、紧张。然而，神学院的一位老师能说英语，因为他在美国安德烈大学完成的学业。他告诉我说，他可以在联合会官员离开之后，晚上接受我的采访。从那以后，神学院的学生们就开始找我，用蹩脚的英语告诉我“当时的真实情况”。这些采访让我知道了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政府坚持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学生在安息日上午上学。会长鼓励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信徒遵守这个规定，他自己的孩子也照做了。但有人告诉我，大多数基督复临会信徒认为这是干犯安息日。我还被告知，教会领袖已经同意，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信徒可以持枪服兵役，还得吃猪肉，别无其他选择，而且也没有遵守安息日的特权。因此，年轻的男性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信徒通常推迟受洗，直到他们服完兵役。

不仅仅只有地方教会的领袖们享受着向共产主义政权献媚的好处。后来在苏联的历史上，全球总会领导人意识到，如果更直接地向政权献媚，就能获得好处。1979–1990 年任职的全球总会会长魏尼尔（Neal C. Wilson，现任全球总会会长魏泰德的父亲）亲自着手负责与苏联当局建立了这样一种互惠关系。在 1979 年，苏联当局急于让分裂分子“真实自由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信徒们的反政府宣传保持沉默，因为他们强烈反对教会与政府建立这样 的关系。对此，魏尼尔写了一封致苏联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全体信徒的公开信进行干预。信中说，“全球总会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只会承认一个统一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组织。……这一组织通常是得到当局认可的……我们鼓励所有自认为是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信徒的人认同公认的信徒团体。”

在随后对苏联的访问中，魏尼尔与苏联宗教事务委员会主席康斯坦丁·哈尔科夫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在他 1986 年和 1987 年两次访问美国期间，哈尔科夫访问了全球总会总部和几个主要的教育、医疗和出版机构。这些接触的结果是，宗教事务委员会批准在莫斯科城外的图拉建立一所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神学院。作为回报，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参与并积极报道戈尔巴乔夫 1987 年举办的“无核世界和人类生存国际论坛”，否认里根总统将苏联描述为一个“邪恶帝国”，并在科学、教育和医学领域提供合作，在教会享有盛誉的《自由》杂志上赞扬苏联的宗教自由，在 1989 年的第三世界宗教自由大会上授予哈尔科夫“人权发言人，宗教自由倡导者”的称号——当时戈尔巴乔夫正在寻求美化苏联的形象。后来，基督复临安息日会还获准在莫斯科设立一家出版社、建立教会总部和一个医疗诊所。

魏尼尔也同样卷入了匈牙利的事务中，当地教会也因为政府公然控制和操纵教会的尴尬而产生了分歧，尤其是同意在一家国营的跨教派神学院培训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牧师。他们也呼吁全球总会承认他们的分裂教会。然而，魏尼尔在 1984 年与匈牙利宗教办公室负责人伊姆雷·米克洛斯（Imre Miklos）会面后再次宣布，全球总会只承认政府认可的教会组织。当他在 1987 年把米克洛斯作为特邀嘉宾带到全球总会年会时，他就以这种方式认可了官方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与政府的关系。

魏尼尔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旅行外交官，陶醉于与政治领袖“合影”的机会。当被问及他对教会的梦想时，他回答说，教会应该“在人数和经济上，以及在世界接受度和影响力方面有所增长”。

讨好独裁者并不总是能如愿以偿。在韩国，在朴（正熙）总统和全（斗焕）总统的军政府时期，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信徒保持了合作与忠诚，他们欣赏军政权提供的稳定和社会控制，他们的校园与其他学校相比仍格外安静。这得到了总统们的赞赏，他们认证了安息日会的学院，随后学院急剧扩张。然而，韩国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在朝鲜战争期间通过与美国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信徒的互动得知，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对服兵役的立场是拒绝接受武装军事训练。在此期间访问的全球总会官员也进一步强化了这一理解。因此，按照美国的模式，韩国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学院向预期应征入伍的人提供了基本的医疗培训，这些人随后要求军事当局将他们分配到医疗单位或不需要使用武器的其他非战斗岗位。然而，由于韩国政府并未颁布迁就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立场的命令，获得非战斗人员的职位只能凭借偶然的机会，不幸的应征士兵有时会发现，他们与一个不同情他们的指挥官在一起，拒绝尊重他们的宗教禁忌。有两名安息日会信徒在战争前线因拒绝持枪而被处决，另外大约 100 名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教友在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因不遵守有关持枪和安息日活动的命令而被判入狱长达 7 年；更多的人遭到殴打或虐待。向朴总统发出的呼吁成功地让其中一些人获释，但这种做法从未解决根本问题。事实上，在 20 世纪 60 年代，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信徒被判的刑期延长了。在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信徒中，与政府在兵役问题上的紧张程度是前所未有的。

当全球总会在对越南战争期间美国教会的分裂作出回应，宣布从此以后服兵役将只是一件关乎个人良心的问题时，为自己的信仰而蒙受巨大苦难的韩国人大吃一惊。后来，随着越南战事的恶化，韩国政府坚持将持枪训练作为所有大学课程的一部分。这一要求使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学院陷入了两难的境地：是遵从新政策，还是拒绝新政策而面临关闭的危险？当韩国教会领导人联系全球总会寻求建议时，全球总会改变了它在上世纪 50 年代所倡导的立场，认为不值得为此事冒与政府对抗的严重风险：持枪训练应该是一个人的良心问题。因此，学院遵循了政府的要求，为学生提供持枪训练，并让学生自己凭良心做出选择，而不是敦促他们做这样或做那样的选择。一位行政人员对我解释说：“如果学院拒绝接受军训，教育部会关闭学校，除非上帝创造奇迹……我们认为开办学院比不参加战斗更重要。”这一决定的结果是，几乎每一个在韩国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学生和新兵都接受了持枪训练。据我所知，因拒绝携带武器而入狱的韩国人有一半以上已经离开了教会。

许多菲律宾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信徒支持总统费迪南德·马科斯(Ferdinand Marcos)，因为他的祖母是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信徒，据说她在小时候带他去上过安息日学课。因此，人们认为他是支持教会及其机构的。20世纪 80 年代，当民众的意见转向反对他的时候，一场推翻他的运动出现了，这让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信徒们感到紧张，因为接替他的主要候选人科拉松·阿基诺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而她的主要支持者是马尼拉红衣主教辛(Cardinal Sin)。1986 年，马科斯逃离，阿基诺当选总统。

复临信徒可能对东欧的共产主义政权感觉舒服，但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拉丁美洲，教会管理部门强烈反对任何被贴上“共产主义”标签的政府或组织，也反对后来被称为“解放神学”的组织，它主要是由像古斯塔沃(Gustavo Gutierrez)这样的天主教神学家提出的，他们支持穷人，声称这是在遵循耶稣的教导。巴西、阿根廷和巴拉圭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领袖积极地和我谈论了那些对抗左翼政权或“共产主义叛军”的军事政权，他们告诉我，他们不相信那些政权杀害、折磨或“消失”反对派的说法。他们还向我保证没有基督复临会信徒被杀，他们的意思是任何与政权结盟的人都不是真正的基督复临会信徒。1986 年我第一次去阿根廷和巴西采访时，两国已经恢复了民主政权，他们抱怨工会又合法了，而且还在进行罢工。他们告诉我，他们更喜欢稳定的军事政权。他们明确表示，尽管像安泽国际(ADRA)这样的教会组织提供了“为食物劳力”等扶贫项目，但他们不赞成通过重新分配富人拥有的大量土地等机制来改变社会结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秘鲁，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海外传教士费尔南多·斯塔尔(Fernando Stahl)和安娜·斯塔尔(Ana Stahl)给安第斯山脉的喀喀湖周围的穷人带来的教育，引发了一场运动，导致了土地的重新分配。)我经常问拉丁美洲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信徒，他们是否读过当时在那里非常有名的《解放神学》，答案几乎都是否定的。我在当时的基督复临会领导人中发现的这种意识形态一直延续到今天：例如，南美分会以与巴西总统博尔索纳罗(Bolsonaro)有着牢固的关系而自豪，后者积极评价早期的军事政权，其副总统是一位将军。

我遇到的最戏剧性的情况之一是在智利。皮诺切特将军早些时候在那里推翻了左派阿连德政权，并从此成为该国长期的独裁者。拍他政权马屁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也因此受惠。在智利，就像在巴西和阿根廷一样，天主教会成为军事统治者的强烈反对者，因为他们严重侵犯人权，而天主教徒们信奉解放神学和同情穷人。因此，皮诺切特迫切需要证明他得到了其他宗教团体的支持。在这三个国家中，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信徒都利用了这个机会。他们邀请皮诺切特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学院(Adventist College)的庆祝活动，该学院有严重的缺点：既没有认证，也没有一条通往校园的像样道路。皮诺切特在一个户外仪式上受到了热烈欢迎，这个仪式被电视台拍摄了下来，当时学院的校长在祈祷中感谢上帝派遣了这位将军“拯救国家”。由于这一宣传的结果，基督复临安息日会被称为“皮诺切特的朋友”。他的政权为此奖励了这所学院，给予其认证和一条新铺的道路。

他们向我解释过很多次，智利的大多数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信徒都很穷，而在所有的教堂中，只有联合会总部的教堂是强烈支持皮诺切特的：大多数基督复临会信徒都是被暗杀的社会党总统阿连德的支持者。南美各地的许多基督复安息日会信徒向我表达了对皮诺切特政权被推翻后可能发生之事情的担忧。

我在危地马拉也发现了类似但更为戏剧性的情况，傅肯伯（Robert Folkenberg，现任香港华安联合会会长傅博仁的父亲，曾任全球总会会长）于1975年至1980年在那里担任中美洲联合会主席。傅肯伯为自己与危地马拉军事独裁者费尔南多·罗密欧·卢卡斯·加西亚将军相识甚深、以至于经常到总统府去拜访他而感到自豪。在他是卸任前往佛罗里达州分会总部担任新职时，他受到了国宴级别的饯行，他是第一位受到如此款待的新教领袖。当我1986年去危地马拉时，我对当地的差会总部大楼的质量感到惊讶。它们位于该市最富裕的地区之一。我很快就发现，这里以前是联合会总部，在傅肯伯离开后不久就突然搬到了哥斯达黎加。我很快就得知许多的相关消息：再一次的，在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地区，绝大多数的危地马拉安息日会信徒非常贫穷，他们是住在城中火山陡峭石壁上的棚户。这些信徒对联合会总部在富人区的奢华和地理位置深感不满。我被告知，在傅肯伯离开那里之后不久，联合会就收到了来自危地马拉叛军的暴力威胁，他们认为这些叛军是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信徒。领导层惊慌失措，迅速决定将他们的总部转移到哥斯达黎加。

在整个拉丁美洲，我多次被告知，牧师的收入很高，事实上，据说他们的收入是他们大多数贫困教区居民平均收入的好几倍。当我在秘鲁安第斯山脉的普诺机场时，遇到了一位玛丽诺尔天主教神父，我们在一个航班上，我们想办法坐在一起。他后来获得了社会学博士学位，就是他告诉我，费尔南多·斯塔尔给安第斯山脉的农民带来了教育，并发动了一场叛乱，终于获得土地的重新分配。这位神父是美国人，他告诉我，他住在一个村庄，那里的大多数人都是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信徒。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牧师不住在那里，因为他的薪水允许他住在一个小城市里；他也不常到村子里去，为了支付他的薪水，他不得不照看好几个教堂。神父告诉我，虽然安泽国际教农民在自己的小块土地上添加一个额外的作物以增加他们的年收入，使他们更好的养家糊口，却是他在村里组织安息日会信徒要求重新分配土地。

在非洲，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经常与当选总统建立密切的关系，这些总统几十年来一直担任着独裁的角色。这些人包括津巴布韦的罗伯特·穆加贝（Robert Mugabe）、刚果（当时称为扎伊尔）的蒙博托·塞塞·塞科（Mobutu Sese Seko）、马拉维的黑斯廷斯·班达（Hastings Banda）、乌干达的约韦里·穆塞韦尼（Yoweri Museveni）和肯尼亚的丹尼尔·阿拉普·莫伊（Daniel arap Moi）。莫伊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来说明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是如何与一位非洲统治者建立互惠关系的。由于这种关系，他让安息日会在巴里顿修建了东非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大学。捐赠的土地并不是教会希望建造一所大学的地方，因为它远离维多利亚湖附近的地区，而维多利亚湖是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信徒在肯尼亚的主要聚集地，而且也远离首都内罗毕。尽管如此，我们的领导人认为，它奠定了总统和教会的良好关系。莫伊是肯尼亚任期最长的总统，任期从1978年到2002年。由于他坚持要掌控全局，他变得越来越有争议性。然而，当1988年，全球总会在内罗毕举行其年会时，正是在一次暴力和抗议活动之后，并且大选临近，全球总会会长魏尼尔毫不犹豫地把他带到年会上，并对其极尽赞扬和宣传之能事，这无疑是莫伊及其政权非常欢迎之举！

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领袖们在批评与他们建立互惠关系的统治者方面行动迟缓。只有那些与我们作对的人，那些我们认为“毫无帮助”的人，例如最近布隆迪的总统，才会成为我们愿意公开反对的统治者。

让我总结一下我向你们介绍的情况。

在与任何可能对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怀有敌意的专制政权打交道时，安息日会关注的核心问题是生存：能够以某种方式继续进行崇拜聚会，避免监禁和遭遇暗杀。主要的方法是通过尽可能与该政权合作来证明我们不是威胁。对于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来说，以下几项是重要的，那就是，尽可能地继续传福音、继续运营学校和其他机构、保护我们遵守安息日的能力、不在军队任义务兵，并继续把教会资金掌握在自己手中。然而，正如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教会所发现的那样，这些目标很难实现；为了实现核心目标，他们做出了一些妥协。

我们发现，在独裁政权的某些情况下，通过教会与政权之间的互惠关系来改善教会及其教友的处境是可能的。这样的好处包括学校的认证以及其它特权，诸如在安息日免上学或免考试，或在服兵役期间免持枪，出版权，发送和接收国际资金，改善基础设施（如改善道路设施）。这种关系包括在其他宗教团体批评这位统治者及其政策的时候，支持和赞扬这位统治者。我们的一些领导人也了解到，互惠关系还可以给他们带来个人荣耀，比如与总统合影、旅行特权、积极的个人宣传，以及获得通常不属于一个小宗教派领导人的特殊待遇。

还有一些别的因素也影响了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与独裁者的关系：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更有可能接受一个与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有亲属关系或其生活方式被视为“几乎是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信徒的独裁者。政治意识形态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尽管这并不总是如此：虽然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与战后东欧的共产主义领导人关系密切，但拉丁国家的教会领袖转而反对智利的社会主义阿连德政府，转而支持声称要保卫国家不受“共产主义叛军”的军事政权。然而，虽然这些教会领袖拥护富人的财产权，但这种立场并没有在大多数教友中引起共鸣，这些教友主要是穷人。智利信徒的不安和危地马拉贫穷教友传递的苦毒和威胁说明了这些问题。这些苦毒和威胁对那里的教会领导人造成了极大的恐慌。还有纳粹德国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悲惨故事，在那里，我们确实驱逐了有犹太血统的成员，改变了我们所谓的安息日，鼓励了我们的教友在安息日到兵工厂工作，让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信徒作为正规军服役，而实际上他们是可以担任非战斗角色的。

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所面临的形势是非常复杂的，而我们似乎没有付出多少努力来确立一个深思熟虑的立场。令我惊讶的是，作为一个对《但以理书》和《启示录》如此熟悉的教会，我们却常常忘记，《圣经》经常把虐待上帝所造之人类的统治者称为“兽”。